

【历史研究】

论郑观应的近代开放意识及实践

房卫青

(山东社会科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2)

[关键词] 郑观应; 近代开放意识

[摘要] 郑观应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观念不断更新的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和实业家, 他的对外开放意识指导并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进程。第一, 他提出了以通商为主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 他主张采用和借鉴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西学”以及企业经营方式; 第三, 具有了国际法的观念和最初的国家主权意识。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01)05-0092-02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丧失了与世隔绝的独立地位, 古老的帝国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系中,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先进的人们提出了学习西方、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号称自强新政的洋务运动, 是中国早期对外开放进行改革的尝试。郑观应正身处其中, 他的近代开放意识指导并深深影响了洋务运动的进程。

一、“商战抗夷”

“商战抗夷”是伴随着中国国势趋向衰微以及民族主权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 一批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新兴官僚、士子从“天朝大国”的逻辑结构中醒悟过来, 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单纯的军事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 而形成的“洋务”外交理念状态下的对外战略观念。

“商战重于兵战”或“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这是“商战”思想在郑观应心目中地位的写照。为什么郑观应把商战置于这样重要的地位? 因为他清醒地看到: “当今之世, 与古者情形不同, 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1]如何抵御外侮呢? 强兵固然重要, 同时还要发展教育, 改良政治, 尤其要发展工商经济。他对比了军事侵略和商务渗透两者的特点: “兵战之时短, 其祸显; 商战之时长, 其祸大。”因为, 在商战中, “彼之谋我噬膏血, 非噬皮毛; 攻资财, 不攻方阵。方且以聘盟为承诺, 借和约为兵刃, 迨至精华销竭, 已成枯腊, 则举之如发蒙耳。兵之并吞祸之易觉, 商之掎克蔽国无形。”^[1]他意识到, 要真正富强, 必须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列强, “我之商务一日不兴, 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 舟师林立, 而彼族谈笑而来, 鼓舞而去, 称心厌欲, 孰得而谁何之哉!”^[1]他设想: 如果中国的商品能

够与西方的商品进行竞争, 洋商就不得不赔本, 赚不到利润, 他们自然就得回国, 这是一个兵不血刃的隐性外交战略。不仅如此, 他还主张, 把商务置于中心地位, 整个国家的国防、外交、教育等等, 都要围绕保护商业而制订政策, 建立以通商为主导的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 “西人以商为战, 士、农、工为商助也, 公使为商遣也, 领事为商立也, 兵船为商置也。”^[1]因而要求引进西方先进工艺, 振兴百工, “有工以翼商”, 与资本主义进行商战。

为了达到商战取胜的目的, 郑观应始终如一地强调两条: 人才和资本。他认为由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 重本轻末, 造成商务经营及技术人才奇缺, 因此必须大力引进外国人才, “自古成事奏功, 未尝不借才异地。”^[1]关于资本, 郑观应意识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发展实业必须有充裕资金。一方面, 应在国内想办法如设股份公司以集股金, 另一方面, 他提出了借助于外力, 吸引外资的开放思想。

二、“取法泰西”

郑观应长期从事商务活动, 经常来往于上海、澳门, 对外国资本主义有着深刻了解。他认为, 要赶上西方, 首先要了解西方,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此言虽小, 可以喻大。……察其习尚, 访其政教, 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 乃知其治乱之源, 富强之本。”^[1]因此, 郑观应每论及经济方面的问题, 无一不作中外比较。据有人对他的《易言》36篇统计, 发现其中运用中外比较的文章多达30篇, 占全篇幅的83.3%, 比较的范围涉及到30多个方面的内容。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在他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他指出: “今彼之所谓天学者, 以天文为纲, 而一切算法、历法、电

[收稿日期] 2001-06-24

[作者简介] 房卫青(1968-), 女, 山东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也。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他还主张，学习西方，可以日本为借鉴。“夫日本商务，既韦韦以中国为前车，处处借日本为先导。我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1]

郑观应对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的输入、工商模式及经济思想的比较和借鉴不是简单的拿来和模仿，而是能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有所扬弃和创新。以盛行于晚清的西洋“珍品”像钟表、音盒等为例，郑观应对这些器物很不感兴趣，反而批评由这些东西引起的盛行于清廷的“玩物丧志”的风气，担心这种风气对整个社会产生误导；对于“电线、火车、耕织、开矿诸机器”，他投入更多的关注，不厌其烦地向人们描述与推荐，指出这些器物为“有益无损者。”

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郑观应积极主张采用近代机器进行生产，他有许多引进和仿造外国先进机器从事生产的论述。他认为：“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以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1]要“自造机器”，认为这样才能“得机器无穷之妙用。”^[1]郑观应既强调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和客观必然性，又考虑到中国人多工贱的实际情况，主张二者兼得，这种符合国情的企业经营思想和求实的精神是其创造性借鉴的体现，直到今天仍还是有意义的。

此外，在举办近代工业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企业经营形式——公司制度。在这一阶段，郑观应等人都认识到，采用西方公司形式，“可收众擎易之功”。在实践中，形成了官营与商营相融合的企业经营方式——官督商办公司制。这是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结合自己国情所设计的一种可行的企业经营方式。郑观应分析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1]他积极投资于洋务派经营的矿业、航运、纺织、电报等行业，并参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大型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和管理，表现出杰出的经营才能和理念。

在企业管理制度上，他十分推崇西方由股东大会选出若干董事组成董事会，企业重大问题授权董事会议决策这一套选举和管理办法。对于航运企业管理机构的产生，他主张“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对于企业经营决策，要组织商董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共商大计，并特别强调企业重大经营方针必须经股东会多数公决。

三、国际法观念

19世纪下半期起源于欧洲的国际法系统地输入中国，作为一个关心时务的洋务中人，郑观应率先以开放的心态肯定了国际法的现实意义。他在1880年出版的《易言》中，第一篇对公法作了阐述：“其所谓公者，非一同所得而私；法者，各国胥受其范，然明许默许，性法例法，以理义为准绳，以战利为纲领，皆不越天情人理之外。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这表明了他已深刻认识到国际法在规范国家行为方面的意义。

基于对国际法知识的了解和研究，郑观应把列强强加

给中国的不平等地位与国际法规范相比照，认识到中国主权利益丧失的严重性，并逐步形成了为中国寻求自身国际地位和权益的主权利益观念。

一是中国的航权问题。近代经济的发展，已使各国贸易以海洋交通为主，航权的存无便直接关系到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和国防的巩固。因此处此时代的世界各国莫不对航权异常重视，特别是内河特权。然而当时的清政府不屑了解国际贸易法则，初关闭海口，拒绝通商，及至列强一再进逼，迭遭战败，不得不开放海禁后，遂将沿海及内河航行权也随之送出。从1856年的《天津条约》到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国长江航权在列强贪得无厌的威胁下逐步丧失。郑观应一生的经历主要在航运界，在三治轮船招商局的经营实践中，他不仅采取了当时较为先进有力的管理措施，而且以其融贯东西之学识，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航权的丧失关系到本国经济利益所在，因此他强烈呼吁清政府要重视航权，收回航权。

二是领事裁判权问题。对于外人在中国屡有不法而引起的中外交涉，郑观应认为应该按照公法来解决，“倘华人理直气壮，授万国公法反复辩争，坚持不挠，彼虽狡狴，亦当无可措词。”他认为，造成领事裁判权的原因是中西立约之时，“以中国法重，西国法轻，判然各异，故议交涉之案，如华人犯罪，归华官以华法治之；洋人犯罪，归洋官以洋法治之。顾有时华洋同犯命案，华人则必议抵偿，并施抚恤，无能免者。至洋人则从无论抵，仅议罚鍰，若过持公论，争执条约，而洋官反暗中回护，纵遣回国，究诘无从，非特轻法未加，抑且无法以制，此尤事之不平者。”^[2]同时指出中外之间的不少交涉是由于当朝官员不熟悉条约和公法而导致的，建议清政府，“倘有通西律，娴清例，其人品学问素为中西所佩服者，大吏得保奏于朝，给以崇衔，优其俸禄。”^[2]

三是设立驻外使领问题。根据公法和国际惯例，郑观应较早提出了设立驻外领事的建议。他说，驻外领事是保护本国民人在外权益的官方机构，各国在中国都设立了领事以保护商民，而中国出洋民人常受外人之辱而莫可申诉，“今中国既与欧洲各邦立约通商，必须互通情款，然无使臣以修其好，联其声气，则彼此扞格，遇有交涉事件，动多窒碍。是虽立有和约，而和约不足恃也。虽知有公法，而公法且显违也，是则使臣之责任不綦重哉。”^[2]

郑观应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观念不断更新的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和实业家，他的思想和实践来自于中国知识分子要求进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心态，也来自于作为落后民族的一员对富强救国的强烈渴望。他意识到了当时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闭关自守已经成为过去，中国只有打开自己的大门，走出封闭的观念，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富强国家。但在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条件下，郑观应的一些主张无法得到实施，但这不是他的主张不好，而是实施的条件不成熟。一旦条件成熟，其主张实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必将有一个大飞跃。事实上，百年之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 郑观应. 盛世危言[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0.

[2] 郑观应. 易言[A]. 载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 上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责任编辑: 翁惠明〕